

灾难记忆与新冠疫情纪念空间构建理路

肖波 黄晶莹¹

(武汉大学 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新冠疫情留下了深刻的集体记忆。抗击疫情的事件、人物、器具、场所、文献等，形成了特定的灾难记忆与文化空间，值得保存、纪念、展示和反思。灾难记忆可通过空间形式来存储和再现，并对记忆进行提炼和延伸，形成特定的灾难型纪念空间，诸如用博物馆再现抗疫篇章、用文化空间再造抗疫地标、用文化符号致敬抗疫英雄、用名录表达对逝者的敬重等。建设系列文化纪念物，有创意地纪念新冠疫情这一历史性灾难，是文化遗产建设的重要使命，也是民族精神浴火重生的时代机缘。

【关键词】 新冠疫情 灾难记忆 文化符号 灾难型纪念空间

【中图分类号】 G112; G260 **【文献标识码】** A

新冠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面对全球复杂严峻的疫情形势，我国为抗击疫情作出了巨大牺牲和不懈努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14亿中国人民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坚韧不拔，构筑起同心战疫的坚固防线，彰显了人民的伟大力量。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抗疫，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成果，国内疫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社会经济秩序有序恢复。在战“疫”中涌现出的感人壮举、英雄人物、抗争精神，令人动容，其间有很多历史见证物。恩格斯说：“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比平时要多得多。”^[2]灾难不应该被忘记，只有铭记历史，补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短板，才能继续砥砺前行。新冠灾难为何要被纪念？疫后如何保存集体记忆并纪念这一世纪灾难？如何构建新冠疫情纪念空间，让后人知悉、铭记和反思这场灾难，化灾难为前行的力量？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问题。

一、灾难记忆：为何要纪念新冠疫情

社会集体记忆是民族认同或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提出，近代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它建立在人们共有记忆的基础上^[3]，集体记忆成为国家形成的前提。以色列建国、苏联解体等史实证明，如何对待灾难所产生的集体记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前途。一个民族共同经历的灾难能够将民族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构建起深刻的集体记忆。延续灾难的集体记忆，后人可以对自我身份进行构建，总结出前人面对灾难的经验教训，凝练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进而认同、弘扬国家文化和民族精神。新冠疫情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空前灾难，给民众、国家和世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这些灾难记忆是疫后构建国家认同、增强民族自信、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资源。

一方面，新冠疫情留下了不能忘却的集体记忆。对个体而言，个人记忆是学习、进步的基础；对国家、民族而言，集体记忆是建构国家认同、推动社会改革进步的根基，在某种程度上，集体记忆建构了国家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相对，源于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他认为共同回忆创造了一种凝聚感，形成“集体意

¹作者简介：肖波（1978-），男，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文化产业。

黄晶莹（1996-），女，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文化遗产。

基金项目：武汉大学“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人文社会科学应急研究”专项课题“后疫情时代的文化纪念研究”（2020YJ06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识”，能为共同体找到一种方式描述他们自己的事实^[4]。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此基础上提出“集体记忆”（又称“社会记忆”，Collective Memory），即“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5]。集体记忆包括集体共享的知识体系，社会群体的形象、叙述、价值观和观念，以及事件的集体记忆发生变化的连续过程。集体行动的过程会沉淀为集体记忆，集体行动越艰苦卓绝，集体记忆就越刻骨铭心。新冠疫情袭来，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在用行动抗击疫情，留下了刻骨铭心的民族集体记忆。党中央立即作出重要部署，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力量建设火神山、雷神山等重症救治医院和方舱医院，派遣医疗队和医护人员对口支援；全国各类企业、社会机构、民间组织和个人倾囊相助，抗疫英雄冲锋在前，专家、医务人员、军人、民警、基层干部、志愿者等用行动筑牢抗疫防线；新闻媒体在第一时间高效、精准报道疫情进展；数亿普通中国人听从国家指挥，居家隔离。全国上下开展了一场艰苦卓绝的抗疫斗争，汇聚成举国空前的集体行动。在抗疫中，民众的恐惧、焦虑、痛心与崇敬、感恩、关爱等情绪交织，混合成为“社会粘合剂”，将所有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固化沉淀成为民族深层次的集体记忆。中国抗疫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人文情怀，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焕发出患难与共、血浓于水的民族精神。抗疫过程更是一段用鲜血和汗水、智慧和毅力书写的历史，不能被时间忘记。作为灾难的亲历者，我们有责任把抗疫历程记录下来、保存下去，这样集体记忆才能得以延续，历史教训才能得到铭记。

另一方面，新冠疫情是值得纪念的空前灾难。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获取的最大教训就是，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6]历史总在不断地告诫后人，但人类对于历史的记忆又常常健忘，以致重蹈覆辙。关于灾难的记忆，往往囿于个体记忆之中，个体一旦消逝，记忆便不复存在。只有通过某种载体使灾难得到纪念，让集体记忆固化下来，才能达成人类的历史记忆的延续^[7]。纪念灾难具有特殊的社会意义：一是纪念灾难，凭吊逝者。对灾难的纪念能够唤醒公众对灾难的感知和记忆，唤起生者对生命的敬畏与思索，是凭吊逝者、抚慰伤痛、纪念英雄、保存灾难记忆的有效途径。修建纪念空间和举办纪念活动均是为了纪念灾难。二是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灾难留下的遗址和物件是通往灾难集体记忆的桥梁。以多种方式记录、讲述灾难的历史过程，将灾难的惨烈和痛苦表象化，以警示幸存者和后世，铭记先烈和历史。三是引导研究，普及科学。纪念灾难是为了反思灾难，从灾难中获得教训和启示，促进对灾难知识的普及和培训，帮助公众树立正确的灾难观。如1995年日本阪神大地震后，日本社会在纪念灾难的同时强调对未来同类灾难的防范，增强全社会的防震减灾意识，以更加理性地应对灾害。

灾难是对能够给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事件总称，又称为灾害、灾祸、祸患、浩劫等。灾难可分两大类：人为灾难和自然灾难。因人为因素导致的灾难称为人为灾难，如战争、恐怖事件、核事故、工业灾难等。二战后，以战争为主题的灾难纪念空间大量建立，在战争废墟上修建较为恢宏的纪念空间，主要发挥表达国家意志、凝聚民族团结、珍惜和平的作用。因自然因素导致的灾难称为自然灾难，地震、火灾、海啸等自然灾难是灾难纪念的重要主题，其纪念空间多位于城市内，目的在于缅怀逝者和教育后代^[8]。此次新冠源于自然，但又区别于一般的自然灾难，人类在其传播过程中充当着重要媒介，疫情的人为防控效果直接与灾难受损程度相关联，防控不力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人为灾难，甚至叠加为“双重灾难”。为重大瘟疫事件成立专门博物馆，世界上已经有先例，如瑞士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Musée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Rouge et du Croissant-Rouge）、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人类疾病博物馆（Museum of Human Disease）、英国德比郡亚姆村瘟疫博物馆（Eyam Museum）等，都为人类抗疫提供了科学价值和精神典范。迄今为止，我国鲜有与瘟疫相关的纪念空间。以此次抗疫为契机，构建新冠疫情的纪念空间，是传承抗疫文化的重要依托。

纪念灾难是强化集体记忆、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自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以来，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国家性纪念空间，以镌刻灾难记忆和展现抗灾壮举。德国柏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Denkmal für die ermordeten Juden Europas）、中国各地的抗战纪念馆、美国的越南退伍军人纪念碑（Vietnam Veterans Memorial）、爱尔兰的大饥荒博物馆（The Jeanie Johnston Tall Ship and Famine Museum）等，都是对灾难记忆的空间表达，旨在以表象物来强化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新冠疫情是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是全人类共同的集体记忆，无论是被病毒无情带走生命的人们，还是默默战斗在抗疫前线的医护人员和始终坚守岗位的工作者，他们的名字和故事应当被铭记。纪念疫情不仅要反思灾难原因，警示后人，更要传承中华民族的抗疫精神，总结抗疫经验，为我国常态化防控疫情、为世界抗击疫情凝聚中国力量，贡献中国智慧。

二、空间表达：人类如何展示灾难记忆

灾难记忆既存储于人心与文献，又外化和再现为纪念空间。记忆主体在空间和时间上进行记忆重构而形成了纪念，纪念需要记忆的表象物来承载。莫里斯·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必须依赖于某种集体场所和公众论坛，大至社会、宗教活动，小至家庭团聚、朋友聚会，都是记忆的公众场所^[9]。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认为，人们在特定的纪念时间和空间里举行神圣的纪念仪式，就会形成以这个时间和空间为节点的“记忆之场”，它具有“物质性”“功能性”和“象征性”。“物质性”指其为依托灾难遗址建立的纪念空间或场所，“功能性”指可在场所内举行纪念仪式或活动，“象征性”指其象征着人们的灾难集体记忆。物化的“记忆之场”即为纪念空间，能唤醒个人、民族及国家的历史记忆，是社会集体记忆中的标志性元素^[10]。纪念空间一般由纪念物及历史环境所构成，其最重要的特质是空间性和纪念性，通过建筑、雕塑、碑等元素来进行空间的限定和形象的塑造，运用隐喻、暗示等表现手法来引导人们思考，从而表达出空间的纪念性^[11]。纪念空间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广泛采用的保存集体记忆的方式，其具体形态丰富而多元。

灾难型纪念空间作为纪念空间的一种，能够激发人们对灾难的情感共鸣和对民族的文化认同，进而实现哀悼、教育、鼓舞等作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12]。灾难博物馆或纪念馆是灾难纪念空间的重要表达实体。刘迪指出，灾难博物馆是以灾难为主题，多数依托于灾难原址兴建，通过呈现人类群体性灾难，供社会进行反思的综合性博物馆空间^[13]。罗梦豪将灾难型纪念馆界定为：为纪念某次重大灾难或灾难中的遇难者，多数依托灾难原址或发生地而建立，同时以展示灾难及相关题材，供社会纪念与反思为主要目的纪念馆^[14]。黄凡认为，记忆需要地点并趋向于空间化，灾害记忆的空间表象体现为记事碑、纪念碑等“纪念物”的构筑^[15]。李佳宁提出纪念景观是通过情感传递创造的精神场所，是反映情感、精神和社会功能的场所，是纪念、哀悼、沉思和集会的场所^[16]。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灾难纪念空间的内涵进一步拓展，虚拟的灾难纪念空间被广泛应用，如奥斯威辛集中营（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毒气室的虚拟探访，是在网络空间中创造和重现过去的创伤^[17]。笔者认为，灾难型纪念空间（Disaster-type Memorial Space）是灾难记忆的空间表达，是为纪念某次灾难，依托原址建立的纪念馆、纪念碑、纪念广场等实体场所或依托互联网建立的虚拟场所，是人类用于记录、缅怀、反思灾难的文化空间。一方面，灾难型纪念空间是灾难过程的物质载体，凝聚着集体记忆的历史遗存和文化地标，灾难中的故事赋予灾难纪念空间以灵魂^[18]，让灾难记忆与有形空间结合起来，帮助民族、集体、个人共同铭记灾难历程。另一方面，人们对灾难的恐惧、对亲人的哀思、对抗灾英雄的崇敬以及对救援者的感恩，共同构成了人类对灾难、对社会、对个人的情感联系，形成了复杂的情感网络。灾难纪念空间有助于引发公众的情感共鸣，实现情感寄托的社会功能。

灾难型纪念空间的命名可体现灾难的发生时间、原因或位置，纪念空间应主要围绕人、物、事三要素展开。纪念行为源于人类本能的情感需求，一切纪念都与“人”密切相关，纪念灾难性事件应遵循以人为本原则，其空间设计宜以人的感知体验为出发点，引导参观者的情感定位、共鸣和升华。客观事物作为“纪念”表达的物质载体，更能引起纪念主体的共鸣。纪念灾难最好的方式是让遗址说话，用真实、客观的遗址最大限度地保存灾难记忆，实现纪念意义的最大化。事件本身是“纪念”的重要内容，准确完整的叙述更能揭示事件真相，引发人们的思考，在纪念灾难事件时坚持叙事完整性原则，将灾难的起因、过程和结果完整地记录和呈现出来，既能让参观者清晰地认识和反思灾难，也是对受难者及其亲属的一种尊重和抚慰。

灾难型纪念空间可划分为不同的表达形态，如在灾难发生地或相关地建馆^[19]，也可以依据事件表达手法分为直接依附于景观元素或以空间变化传达纪念情感两种类型^[20]。近几十年来，灾难纪念建筑逐渐从单一纪念碑式向多空间组合式转变，更多地使用象征主义元素来唤醒精神上的反思，用整体景观而不是单一纪念物进行呈现，来表达纪念场所的历史感和空间感^[21]。作为对灾难记忆的空间表达，往往通过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的模式^[22]，将记忆存储、延伸和提炼。再现灾难记忆的形式通常有三种：一是存储记忆，纪念馆与灾难遗址结合，形成灾难遗址型纪念空间；二是延伸记忆，纪念馆与城市公园结合，形成主题公园型纪念空间；三是提炼记忆，纪念碑与纪念广场结合，形成文化广场型纪念空间。这三类空间表达方式在国内外都有先例。

记忆存储型空间表达方式，如四川省汶川特大地震纪念园。为纪念 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地方政府在震中映秀镇修建了地震纪念园，由漩口中学遗址（图一）^[23]、映秀震中纪念馆（图二）^[24]、纪念陵园构成。漩口中学遗址保留了

大量地震后歪斜、坍塌的教学楼和宿舍楼，教学楼前是地震纪念组雕和汉白玉雕塑“汶川时刻”；映秀震中纪念馆包括以“流水”“地殇”“崛起”“希望”为主题的四个庭院，分别通过水、石、树、光等要素营造场所精神^[25]，客观展示灾难现场，叙述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历程。纪念陵园由遇难同胞纪念墙、抗震救灾叙事墙和纪念碑组成。整个纪念园将空间序列的组织、场所精神的营造与展览的主题内容形成密切关联，成为人们缅怀、纪念汶川大地震的第一现场和精神家园。



图一//汶川漩口中学遗址



图二//“5.12”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震中纪念馆

记忆延伸型空间表达方式，如美国“9·11”纪念博物馆（The 9/11 Memorial & Museum）^[26]。为纪念 2001 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9·11”纪念博物馆在世贸中心（World Trade Center）遗址落成，主要由博物馆、纪念馆（含纪念广场）两部分构成^[27]。博物馆内，由近 3000 名不同性别、肤色、年龄和表情的罹难者肖像形成的照片墙（图三）^[28]，表达对遇难者的缅怀和遇难者家属的追思。纪念馆是世贸双子塔纪念广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唯一建筑^[29]，其入口处保留了两根顶端呈三叉戟形状的巨大钢柱，这原是双子塔建筑结构中的一部分，震撼至极。纪念馆外的纪念广场上，双子塔遗址赫然在目，在此基础上修建了两个凹入地下的正方形瀑布池（图四）^[30]，水池外围的青铜墙上刻着 2983 名遇难者的名字，将亲人、同事、朋友的名字刻在一起，在闹市中形成了一片宁静、美丽、和谐的纪念空间，让人既能充分感受到双子塔的存在，又能获得深度的纪念性体验。



图三// “9·11”博物馆照片墙



图四// “9·11”纪念馆和瀑布池



图五//黑龙江省哈尔滨防洪纪念塔广场

记忆提炼型空间表达方式，如黑龙江省哈尔滨防洪纪念塔广场（图五）^[31]。为纪念哈尔滨人民战胜 1957 年特大洪水，防洪纪念塔广场于 1958 年在松花江畔建成。广场由纪念塔、喷泉、围廊和广场四部分组成。纪念塔下部是人民战胜洪水的群像浮雕；中部浮雕讲述防洪筑堤的艰险过程；顶部由工农兵和知识分子的圆雕组成，突显抗洪抢险的英雄形象。纪念塔外面环立的 20 根科林斯圆柱构成罗马式半圆围廊，形成和谐统一的文化广场景观。防洪纪念塔广场既表达了对抗洪英雄的尊重和感恩，又展现了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成为哈尔滨市的重要文化符号，并入选第二批中国 20 世纪建筑遗产名单。

为存储记忆而建设灾难遗址型纪念空间，为延伸记忆而建设主题公园型纪念空间，为提炼记忆而建设文化广场型纪念空间，上述经典案例为灾难记忆的空间表达进行了有益尝试和可贵探索。基于纪念灾难的共识，灾难纪念空间的表达方式是多元和立体的。通过多维组合共同营造有意义的文化空间，以表达对灾难的纪念、对灾难记忆的存储和再现。这些宝贵经验对新冠疫情纪念空间的构建不无启发。

三、记忆再现：新冠疫情纪念空间构建理路

新冠疫情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蔓延到多个国家和地区，引起全球性灾难。随着国内疫情得到缓解，在严防输入的同时，应及时对抗疫工作总结和反思，疫后有必要在抗击疫情的英雄城市武汉修建系列纪念物，以纪念被病毒夺去的生命，弘扬抗疫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铭记战“疫”的经验教训，进而反思灾难和凝聚民族认同。抗疫纪念物的本质就是要以空间表达的方式，对灾难记忆进行存储和再现。

一个民族共同经历的痛苦和灾难成为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新冠疫情给人民、国家和世界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痛，抗击疫情成为全民族重要的集体记忆。灾难不应该被忘记，疫后应保存集体记忆、纪念这场灾难。科学布局文化空间，让后人知悉、铭记、反思这场灾难，化灾难为前行的力量。考虑到灾难记忆的特点和空间表达的方式，宜在我国为抗击疫情作出重大贡献的武汉市选址，规划建设系列文化纪念物；宜聚焦人、物、事三要素，用多元方式表达对灾难记忆的储存、延伸、提炼和镌刻，让抗疫故事深刻留存并立体呈现。可综合考虑以下四种路径。

其一，储存灾难记忆，用博物馆再现抗疫篇章。抗疫过程中的文献、实物和口述资料，具有重要的收藏、纪念和研究价值。“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32]通过博物馆收藏灾难逝者或亲历者的私人物品，如照片、日记、衣物等，展示抗疫过程、个例和细节，是保存个体记忆的必要手段。疫后可考虑将原废弃仓库改造的方舱医院作为馆舍，建设集科普、公共卫生、生物、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抗疫博物馆。博物馆外观可突出抗疫特色，如放大的病毒模型、逆行者大鹏展翅形象等，馆内定期举办纪念仪式和活动，使之成为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有机融合的载体。

其二，延伸灾难记忆，用文化空间再造抗疫地标。将纪念空间巧妙融入城市生活空间，让部分停用的抗疫场所转变成为新的城市地标。可利用完成使命后不再使用的部分抗疫场所，打造抗疫主题的纪念公园、纪念广场或文化街区等开放型文化空间，注重空间的情感表达。一方面为缅怀逝者、致敬英雄、教育反思而营造不同空间氛围；另一方面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展现人类共同抗击疫情的时间轴和典型事迹，以开放的姿态接纳世界不同受众，展现人性光辉。

其三，提炼灾难记忆，用文化符号铭记援助恩情。文化符号折射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内在气质和社会共识。抗疫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内在气质，凝聚了社会力量，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参与抗疫的英雄个体和群体应该被历史铭记。疫后可在抗疫重点医院如金银潭医院、火神山医院设立纪念雕塑，在定点医院设计小的纪念碑或纪念砖，铭记给予援助的医疗单位和医护人员；在大型公共空间树立抗疫英雄纪念碑和雕像群等标志性文化符号，以弘扬抗疫精神，表达感恩之情。

其四，镌刻灾难记忆，用名录表达对生命的敬重。灾难过后，不少幸存者面临亲人逝去的痛苦，灾难纪念空间成为缅怀逝者、重塑生者希望的重要场所。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是世人的共识，每一个不幸被疫情夺去生命的人都应该被记录。疫后可择址建造名录墙或面孔墙，为生者提供一个哭泣疗伤的精神之墙，以文明祭奠亲人、寄托哀思，安放个人记忆，同时，疫情名录

墙也可成为珍惜生命、携手应对困难的希望之墙。

上述四种方式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多元组合、有机融合的，共同作为构建新冠疫情纪念空间的方法和模式。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全球抗疫是当代社会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疫后应及时反思灾难、纪念灾难，把握灾难背后的精神财富和珍贵契机。作为抗击疫情的典范，武汉宜以新的城市面貌展现英雄城市文化和抗疫精神。建设系列文化纪念物、构建灾难纪念空间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灾难纪念空间在内容表达上可把握缅怀、纪念、反思的主旨，突出“以人为本”的原则；在表现形式上组合利用多种纪念物，整体表现文化景观，突出抗疫精神；在功能上将纪念功能和教育功能相结合，为缅怀逝者、纪念英雄、教育后代提供精神文化场所。总之，借鉴国内外灾难型纪念空间的建设思路和经验，在疫情“震中”武汉市选址构建新冠疫情纪念空间，可实现对灾难记忆的储存与再现，帮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以更加从容自信的姿态迎接未来挑战。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第2版。

[2] [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49页。

[3] [美]安德森著、吴睿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4] [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译：《社会分工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40页。

[5] [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著，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35页。

[6] [德]黑格尔著，杨东柱、尹建军、王哲译：《法哲学原理》，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51页。

[7] 刘迪：《灾难博物馆与灾难教育》，《城市与减灾》2013年第4期。

[8] 牛景龙：《城市重大灾难型纪念空间周边环境圈层规划》，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

[9] 同[5]。

[10] [法]皮埃尔·诺拉著、黄艳红等译：《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11] 陈蕴茜：《纪念空间与社会记忆》，《学术月刊》2012年第44期。

[12] 范可：《灾难的仪式意义与历史记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8期。

[13] 刘迪：《灾难博物馆定位问题初探》，《中国博物馆》2013年第1期。

[14] 罗梦豪：《灾难纪念馆空间体验设计研究》，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5] 黄凡：《灾害记忆空间的建构——以通海大地震中的记事碑为例》，中国民俗学会2016年年会论文。

-
- [16]李佳宁、林旭东：《遗址纪念景观空间初步研究》，《美术教育研究》2018年第23期。
- [17]Lutz Kaelber. A Memorial as Virtual Traumascape: Darkest Tourism in 3D and Cyber-Space to the Gas Chambers of Auschwitz, *Ertr, e Review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24-33.
- [18]肖波、陈泥：《从抗疫故事、情感主题到场景再现：瘟疫遗产地构建的欧洲经验和模式》，《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 [19]同[13]。
- [20]温昕、张磊：《人为事件型灾难纪念空间的主题表达手法探讨》，《美术教育研究》2018年第22期。
- [21]王丹：《基于环境认知的灾难纪念型景观设计研究》，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 [22][德]阿莱达·阿斯曼著、潘璐译：《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6页。
- [23]湖北省地震局官网：《探访映秀漩口中学地震遗址全国网媒向遇难同胞献花祭奠》，[EB/OL][2018-05-07][2021-03-13]
<http://www.eqhb.gov.cn/info/1494/14212.htm>.
- [24]5.12 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官网，[EB/OL][2021-03-13]<http://www.512dzjng.com/content/column/4726101?pageIndex=1>.
- [25]何镜堂、郑少鹏、郭卫宏：《大地的纪念映秀·汶川大地震震中纪念地》，《时代建筑》2012年第2期。
- [26]The 9/11 Memorial&Museum-Visit. [EB/OL][2021-03-13]<https://www.911memorial.org/learn>.
- [27]蔡琦：《试论作为黑色旅游目的地的纪念馆设计——以美国9/11纪念博物馆为例》，《中国博物馆》2020年第3期。
- [28]The 9/11 Memorial&Museum-Visit: In Memoriam, [EB/OL][2021-03-13]<https://www.911memorial.org/visit/museum/exhibitions>.
- [29]周婧景：《具身认知理论：深化博物馆展览阐释的新探索——以美国9·11国家纪念博物馆为例》，《东南文化》2017年第2期。
- [30]The 9/11 Memorial&Museum-Visit: The Memorial-Tribute in Light, [EB/OL][2021-03-13]<https://www.911memorial.org/visit/memorial>.
- [31]搜狐网：《畅游东北感受我国大东北的独特风情！》，[EB/OL][2018-08-28][2021-03-09]https://www.sohu.com/a/250580760_356022.
- [32]师永刚、刘琼雄：《国人到此低头致敬：中国建川博物馆聚落》，新星出版社2008年，第9页。